

海涅 席勒 茨威格



张玉书 著



张玉书 著

海涅
席勒
茨威格

北京大学出版社

海涅 席勒 茨威格
· 德语区国家文学论集 ·

张玉书 著
责任编辑：胡双宝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748照排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00千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7,200册

统一书号：9209.93 定价：2.70元

匆忙的回顾

研究德国文学的人心情都很矛盾：想评论一些作家，可是这些作家还介绍不多，或者根本没有介绍过来。这样，写评论就不可能在广大读者中得到反响。于是就想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然后再来评论。可是翻译是另外一门学问，会写文章未必就能翻译。再说，翻译一部巨著，旷日持久，就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写评论。于是，痛感分身无术，左右为难，也痛恨年华流逝，岁月蹉跎。

这些年来，钻研学问已经不再受人指责，而是受到鼓励。我就象突然离开禁闭多年的暗室，跳进阳光灿烂百花盛开的花园，看见姹紫嫣红、婀娜多姿的奇花异卉，真是目不暇给，爱不释手；时而欣赏一下含羞草、勿忘我，时而把玩一下君子兰、郁金香，留连忘返，喜极忘形。久饥的人恨不得狼吞虎咽人世间一切美味可口的山珍海味，渴极的人恨不得牛饮鲸吞天底下所有醇香凛冽的玉液琼浆。这种贪婪狂喜急迫焦灼的心情，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吧。

这些年里，我时而翻译小说、论文，时而翻译诗歌戏剧，时而写游记，时而写评论，虽然每件事都做得匆匆忙忙，不够完美，可是一直兴致勃勃，劲头十足，既反映了上面提到的这种矛盾，也表现出我们这代人特有的心情。有多少旧梦有待重演，有多少夙愿还未能得偿啊！

海涅是我的旧梦，是我的夙愿。他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德国诗人。大学一年级时，有位喜欢音乐的老师热心地教我们唱海涅

的《罗累莱》、《歌之翼》，鼓励我们这些语法还没学完的初学者去读海涅的《诗歌集》。我不知道八十年代的青年是否会喜欢他的诗，我们当时读他的诗都入了迷。初生之犊不畏虎。我按捺不住，在朋友的鼓励下，在三十年前的一个暑假里，怀着激情，一口气译完了《抒情的插曲》，不无得意地把译稿交给我的朋友，希望偶尔能听到一句半句赞词。哪一个译者没有这种心情呢？不料我的朋友读后却对我说：“我想象中的海涅的诗应该更凝练、更典雅。”我朦朦胧胧地感到此话有几分道理，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便怀着侥幸的心理，把译稿送给我的老师审阅。我的老师对我译稿的评语是：“流畅有余，含蓄不足。”

这八个字陪伴了我三十一年。每当我译完一段文字，我就拿这八个字当作尺子来衡量。它们虽然常常使我泄气，可是最后总鞭策我、鼓励我继续努力，继续前进。它们使我渐渐懂得学习外语和汉语是个漫长、艰巨的过程，让我慢慢克服年轻人的浮躁、轻率、急于求成的情绪。大学毕业后，花了好几年功夫，一字一句地认真练笔。

在练笔过程中，我试译了海涅的《论浪漫派》。二十年前一阵肃杀的狂风吹来，把我译的《论浪漫派》吹进了我的一只破纸箱。直到噩梦过去，它才奇迹般从冬眠中醒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了它的单行本，接着又决定出版《海涅选集》（文艺理论卷），其中包括我译的《论浪漫派》。我的老师让我编选《海涅选集》（诗歌卷），嘱我翻译《诗歌集》，于是我把在破纸箱里安卧了二十八年的《抒情的插曲》又找出来，重译一遍，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

为这两卷《海涅选集》，我写了《思想家海涅》和《诗人海涅》两篇文章，分别作为这两卷的前言。

六十年代初，我最早发表的几篇译文是席勒的美学论文和爱

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的片断。我和一个朋友合译了席勒的《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发表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学习德国古典文学，当时我对歌德、席勒这两位德国古典文学的大师还知道得很少。在翻译《论浪漫派》的时候，海涅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歌德作为诗人，我从未攻击过，我攻击的只是他这个人”^①。可是他对席勒这个人却充满了敬意。一读席勒的传记，看到这个诗人和逆境搏斗终生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我感到席勒可亲可敬。这位孜孜不倦，刻苦学习，废寝忘食，辛勤笔耕的德国诗人是我们的楷模。于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我的朋友一起译了他的名剧《玛利亚·斯图亚特》，写了几篇关于他的文章，与其说是评论、介绍这位杰出的诗人和他的作品，毋宁说是借此更深入地学习、理解他的文章风骨。

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我另一个旧梦。十九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个使高尔基感动流泪的名篇，内心的感受就象初读《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时那样。它感人肺腑、动人心弦，催人泪下。我总认为，真正的爱情是使人向上的，是崇高的，是神圣的。这篇小说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那时候，我就想把它译出来，呈献给我的读者。这篇小说缠绵悱恻，写得那样深情，那样真实，那样令人信服，我怀疑，茨威格自己就遇见过一个“陌生女人”，他一定有过类似的经历。于是我进一步去探寻，去了解，结果证实了我的估计。小说不仅取材于现实生活，作者还在小说中进行自我剖析。这位善于心理分析的大师发现司汤达、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都在描述自己，称他们为“描述自我的诗人”，他自己在这篇小说里也在描述自己，刻画自己。如果说，茨

① 参见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五十二页。

威格的“陌生女人”和小说中的“陌生女人”有类似的特点，那么小说中的作家R身上也有作家茨威格的某些性格特征。我不仅想翻译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心愿，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茨威格和他的“陌生女人”，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位作家，他的爱情和他的悲剧。

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像是为普天下精神受过摧残，心灵受过蹂躏的人写的。残暴的法西斯施加在人们肉体上的酷刑是有形的，对人精神上的折磨是无形的。无形的暴行往往比有形的暴行更为残酷，更为狠毒，给人的创伤更难治愈，更难克服。《象棋的故事》揭露了法西斯对人们灵魂的残害，写得震撼人心。它使人不由得想起那些凶残暴戾蛊惑人心的伪君子们恩施在人们身上的“德政”。

这些年我又了却了一个旧日的心愿，怀着激情译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又译了《象棋的故事》和《爱与同情》（原名《心灵的焦灼》）。这些作品把我引进一个色彩绚丽、景色奇幻的新天地，像陆沉海底的名城，深埋地下的迷宫，这就是人的内心世界。我仿佛登上一座高山的峰巅，看见了更加辽阔的天际，引起无限遐想，萌生新的追求。

这个集子记录了我过去十年做的部分工作，也预示了我今后努力的方向。我对这些年来鼓励我支持我走过这段不算太平坦的道路，实现我的这些梦想的老师、朋友们怀着由衷的谢意。他们在我颓废时，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在我彷徨时，向我投来信任的目光，在我沮丧时，向我露出亲切的微笑，在我痛苦时，向我送来宽慰的话语。他们将永远留在我美好的记忆里，成为我继续进取继续开拓的动力。但愿我今后的工作不使他们失望。

这里收集的文章大多发表在《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学报》、《国外文学》等刊物上或附在翻译的作品里或编选的集子里作为前言。只有少数几篇文章没有发表过，它们是：《与逆境搏斗终身的人——弗里德利希·席勒》、《人道主义者斯蒂芬·茨威格》、《心理分析的大师——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张玉书

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畅春园

目 录

歌德与席勒	1
海涅与歌德	20
思想家海涅	31
诗人海涅	47
与逆境搏斗终身的人——弗里特里希·席勒	71
席勒的历史剧《玛利亚·斯图亚特》	108
弗朗茨·梅林和他的文学批评	127
德语国家的中短篇小说	155
人道主义者斯蒂芬·茨威格	165
《爱与同情》(原名《心灵的焦灼》)的艺术特色	186
茨威格与高尔基	194
茨威格与弗洛伊德	207
心理分析的大师——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223
人名对照表	239
书名对照表	248

歌 德 与 席 勒

在魏玛剧院前的广场上矗立着歌德和席勒这两位伟大诗人携手并肩而立的塑像，象征着德国古典文学的这两位伟大代表之间真挚的友谊和亲密的合作。这两位挚友之间的友谊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

一百多年来，不少文学史家和传记作者对魏玛公国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德国境内的巴拿斯山、欧林匹亚，那里英才毕集，群星闪耀，从歌德、席勒之间的友谊结出德国古典文学最瑰丽璀璨的花朵，出现了文学史上令人惊羡赞叹的“魏玛盛世”。于是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莱茵河左岸的法国人民流血奋战、拼死推翻的那个腐朽罪恶的封建制度，在莱茵河右岸德意志境内却成为人类杰出的精神产品生长发展的最温和的气候和最肥沃的土壤。而法国革命人民经过殊死斗争予以推翻的封建君主，在德意志境内却是奖掖文化、促进艺术的明君英主。不管这些学者的动机如何，结论就是如此荒谬。

因此，研究一下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关系，看他们如何相识，如何交往，如何从互不相识到彼此了解，弄清楚他们友谊的产生，究竟是命运安排、纯属偶然，还是顺乎情理、势所必然，这不仅有助于对这两位诗人的性格和品质、对他们这一阶段的生活和活动有进一步的认识，也可以扫除蒙在“魏玛盛世”之上的一层“玫瑰红的蛛

网”^①，对古典文学及其产生的时代有一个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了解。

二

一七七九年，歌德随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访问斯图加特，参加了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在他那被人称作“奴隶培训所”的卡尔学院向优秀学生授奖的仪式。三十岁的歌德早已是一个名扬四海的天才诗人，少年得志，青云直上，一帆风顺，如今作为魏玛公国的重臣、枢密顾问，和两位公爵站在一起，而比他年轻十岁的席勒还是一个普通的军校学生，排在受奖学生行列之中，没有引起歌德的注意。他们年龄不同，境遇不同，道路不同。在封建社会里，门第、出身、财产、地位，远比个人才华、学识、品德更为重要。歌德和席勒之间的这些差异照理应该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横亘在他们两人之间，使他们非但不能建立友谊，甚至不能再次见面。

然而，他们个人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不是扩大他们之间的差异，而是使他们越走越近。

一七七五年，歌德二十六岁，应卡尔·奥古斯特之邀，来到魏玛。他雄心勃勃，意气风发，一心想要发挥才能，施展抱负。十年宦海浮沉，使歌德心灰意懒。他的改革措施受到了重重阻力，无法推行。这固然是宫廷宵小从中作梗、多方掣肘，更主要的是，公爵对他并不支持。歌德最后发现，公爵并不了解他。在他给封·斯泰因夫人的信里反映出他四处碰壁、十分绝望的心情：“我总是说，谁要是主管行政工作，自己却不是掌权的主人，那么此人不是市

^① 参看梅林：《论文学》（张玉书、韩耀成、高中甫译）第九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佻，便是坏蛋，或者傻瓜。”^①下面这句话既表现出歌德对公爵的批评，也包含着歌德的失望：“青蛙生来是水里的动物，尽管它有时候也会在旱地上呆一阵”^②。

在魏玛这个小巢里呆了十年，使歌德才思枯竭，诗兴泯灭，外界几乎忘记了这位诗人！他感到窒息、压抑，终于在一七八六年离开魏玛，出走意大利，到古希腊罗马文艺的晴朗天空下去呼吸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

显然歌德是不满于德国的、魏玛的鄙陋状况而遁迹于古代艺术之中。对他来说，狂飙突进运动已成往事，当年的强烈激情、反抗精神已为对古代艺术的宁静、和谐的追求所代替。他对此时的革命风暴不会不感兴趣，凭他的睿智、敏感、洞察一切的观察力和精细入微的判断力，他不会没有看出这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对他来说，大革命不是爆发于一七八九年，也不是一七九一年，而是在更早的时候。但是，他身为德意志一个公国的重臣，不能像诗人克洛卜斯托克那样向德国人高呼：“法兰西自由了，你们还犹豫，还沉默？”四十岁的歌德也不可能像十九岁的荷尔德林那样，写首《自由颂》，并且和他的同学黑格尔、谢林一起种上一棵自由树来欢迎法国大革命。在官场上呆了十几年，歌德变得老成持重，城府很深，而要保全自身于乱世之中，也不能轻易表态。歌德只是在个别场合说了有限的几句话，但是这已经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一七八二年瓦尔密炮战时，他说了这样一句名言：“此时此地，开始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你们可以说，你们当时在场。”美因茨围城时，他冒险救了一个雅各宾党人。一七九三年以后他保

①② 参看梅林：《论文学》（张玉书、韩耀成、高中甫译）第九十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持沉默。他一生从不掩饰对拿破仑的崇敬。这一切说明他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党人是同情是赞赏的。我们怎能要求他更明确地表态？！德意志各邦君主是法国大革命不共戴天的仇人，是企图扼杀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凶恶的刽子手。联军统帅布劳恩许魏格公爵恶狠狠地扬言要把巴黎夷为平地，魏玛公爵是他麾下的一名将军，随他讨伐法国，而歌德则被迫随军同行，充当魏玛公爵的幕僚。倘若歌德热衷于这次征讨，他断然不会在军中寄情于颜色学的研究，沉湎于光学论文的撰写，而对联军的胜负却表现出极度的淡漠。在这高深莫测的沉默淡漠的面孔后面，掩盖着他对形势的极度关切。他密切注视着法国大革命的发展进程。使他失望的是，革命党人干了不少使人痛心的蠢事错事，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着权力之争、互相残杀。昨天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的革命家，今天成了革命的敌人而死于断头台上。连罗兰夫人在临刑时也仰天长叹：“啊，自由！用你的名义，人们犯下了多少罪行。”这些流血的暴行使歌德反感。每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要想对它作出冷静的、全面的、公允的评价，往往需要隔开一段时间。要同时代人，远离事件的中心，作出恰当的评价，往往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法国大革命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发展，完全符合革命的目的，采取的也不全是为了达到这革命目的所必然要采取的手段。参加革命的人自身性格上、品德上的弱点也会对革命的进程投下阴影，使它发生一些曲折、倒退，造成或大或小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

一方面是德国的鄙陋状况，令人窒息的空气，另一方面是革命过程中发生的流血暴行，于是歌德深感失望。中国古代的诗人，在乱世时，逃进深山，遁入空门，钻研佛经，寄情山水，抚琴作诗，以摆脱烦恼，避世苟安。歌德当时对古代文化、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不

是也有相似之处？

三

席勒如何呢？

一七八一年《强盗》上演，年轻的诗人席勒一举成名，然而等待着诗人的却是坎坷的道路和险恶的命运：夤夜出逃，贫病交困，几年漂泊，历尽艰辛，与逆境搏斗，弄得一身是病。尽管因为《强盗》、《阴谋与爱情》而名满天下，可是一直寄人篱下，无室无家，全靠朋友的资助。一七八七年七月，席勒从莱比锡前往魏玛，除了他的名声之外，只携带一部剧作手稿《唐·卡洛斯》，既无固定收入，亦无固定职业。

一般传记作家认为，自从席勒来到魏玛，便结束了他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涯。他们津津乐道：席勒在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中被任命为耶拿大学的副教授，讲授历史。翌年五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就任职教，从此有了固定的收入。一七九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和夏绿蒂·封·伦格费尔特结婚，从此安居乐业，一帆风顺。殊不知魏玛这座“巴拿斯山”，对于席勒并非乐园。他虽然被任命为副教授，可是没有薪金。“奖掖文艺”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给席勒的全部资助是每年二百塔勒的年金，而席勒婚后，要维持一家的生计，每年至少要有一千塔勒才行。生性高傲的席勒自然不会向公爵乞求恩赐，他甚至拒绝接受公爵在他生病时给他加倍的年金。他拼命工作，鬻文为生，为几个出版商撰文写稿、编辑刊物。每天废寝忘食，连续工作十四小时。婚后不到一年，他的身体就因为操劳过度彻底崩溃，几乎一病不起。外界讹传，席勒已经病逝。丹麦的几位席勒崇拜者甚至为他开了追悼会。事后他们听说，席勒贫病交困，家里几乎有断炊之虞，便给他提供三年年金，每

年一千塔勒。

• 魏玛公爵对于席勒的病情和困境，视若无睹，置若罔闻。以德国之大，德意志各邦君主之众，竟没有一个真有爱惜贤才之心，竟忍心让这样一个举世罕见的奇才在贫病交迫之中挣扎，也无人效法这几个丹麦人的榜样，继续给以资助。这便是德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席勒的恩典，封建社会奖掖文艺、珍惜人才的神话的实质。卧病在床的席勒能不寒心？

一七九二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宣布席勒为共和国的荣誉公民，和他一同获得这一称号的只有克洛卜斯托克、彼斯塔洛齐^①等极少数人。对于一个自由战士来说，这是极大的荣誉。席勒密切注意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在巴黎的朋友不断给他送来最新的消息。《强盗》的作者看见自己的理想在法国已经化为行动，自然深感欣慰。他甚至打算离开魏玛，前往巴黎，可见他对革命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向往。这位理想主义者想象中的革命是正义战胜邪恶，人们为崇高的理想献身，是无比高尚的行动。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看到的是丑恶的暴力行为，肮脏的权力之争，野蛮的互相残杀，于是他和歌德一样也感到迷惘和失望。他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是始而欢迎，继而拒绝。这当中有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知道德国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推翻专制暴政只是纸上谈兵。失望之余，埋头史籍。这位自由战士的琴弦在这几年里也喑哑无声，他也遁入古代文化。就象他给友人的信上写的：“在今后两年内，我决定再也不读现代作家的作品……只有古代作家现在给我真正的享受，同时我极其需要他们来净化我自己的趣味。”德国的鄙陋状况使他看到旧世界封建制度在人的身上打下的烙印，而莱

① 约翰·亨利希·彼斯塔洛齐（一七四六——一八二七），瑞士人道主义教育家。

茵河彼岸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形势又使他看到新时代人身上的其他污点，于是他竭力追求充溢在古典文学里的人道主义精神，来实现更完美更高尚的人类。这种追求，和歌德的追求一样，同是一种逃避。

其实席勒才能出众，歌德也承认：“他在茶桌旁超群出众，在内阁会议里会同样出类拔萃”^①，他完全可以在“积极的公众生活”中成为一个伟人。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哪里有平民的发言权 and 发展的余地！连歌德在政治舞台上都不能有所作为，席勒就更谈不上。于是他们只好在精神领域里去施展他们的抱负，就象恩格斯说的：“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藉，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②这番话反映了歌德、席勒当时共同的心情和处境。

四

友谊的基础是志同道合，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相同，对德国鄙陋状况的失望相同，但是这还并不足以构成歌德、席勒这两个之间友谊的基础。事实上，歌德和费希特在这两点上也完全相同，但终于没有成为知交。在大前提一致的情况下，个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建立友谊的决定性的因素。

席勒在一七八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到魏玛，就对歌德进行了解。早在卡尔学院时期，席勒就把歌德当作自己崇拜的对象。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夏尔芬斯泰因回忆道：“歌德根本就是我们的上帝”。

① 参看歌德与爱克曼《谈话录》中一八二八年十月一日谈话。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

另一个同学说：“我们这些朋友对《维特》和《葛兹》的作者赞赏不已，简直恨不得跪下去顶礼膜拜。”席勒尽管已是著名诗人，但他还是感到自己在艺术上不如歌德。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的语言已经带上了现代的特色，“我完全缺乏葛兹的作者如此鲜明地向我们表现出来的素朴”。到了魏玛之后，他听见许多人怀着崇拜的心情提到远在意大利的歌德。他们“爱他，赞扬他这个人，甚于他这个作家……他在各方面都是完美无缺的”。赫尔德告诉他，歌德“毫无阴谋诡计之心，他从未有意迫害过任何人，从未损坏过任何人的幸福”。

不久，歌德就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这些品质。一七八八年十二月，有人代席勒谋求耶拿大学副教授的职位。歌德征得公爵同意，写了任命书。在这文件里，他先对席勒的史学著作《尼德兰独立史》作了一个良好的评语，然后写道：“认识他的人，对他都有好评，对他的品格和生活方式也都予以赞美。……他的举止严肃、态度和气，可以相信，他对年轻人将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尽管三个月前，歌德刚从意大利回来和席勒第一次正式会面时，歌德态度冷淡，两个人并没有象伦格费尔特姐妹^①所希望的那样，一见如故，成为朋友，可是歌德还是帮助了席勒。席勒收到任命书后去拜访歌德，表示自己学识有限，怀疑自己能否胜任。歌德赠他一句拉丁文：“Docendo disciter”（边教边学）以示鼓励。席勒的未婚妻夏绿蒂·封·伦格费尔特是歌德的密友封·封泰因夫人的教女，她从小就认识歌德，对歌德充满敬意和信任。席勒告诉夏绿蒂：据说，歌德曾对人说过，只要他认为有利于席勒幸福的事，他总乐于为之

①. 指席勒后来的妻子夏绿蒂·封·伦格费尔特和她的姐姐卡洛琳娜，当时两人均是席勒的好友。